

# 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多样化表现

陈旭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的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鸠摩罗什 龟兹 佛教 石窟艺术

中图分类号 J1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577(2008)02-0029-04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的枢纽地带,新疆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源于新疆丝绸之路的得天独厚的位置,正如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中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sup>[1]</sup>从远古时代开始,新疆就与中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中亚、印度次大陆乃至西亚、欧洲、非洲等地有了频繁的交流往来,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于此,各色种族、民族迁徙往来,成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承载主体,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周边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粟特文化等纷纷在西域产生影响。由于融汇的东西方文化因子和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以汉文化和犍陀罗文化并行为特点的鄯善、且末文化圈;以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文化圈和龟兹文化圈。<sup>[2]</sup> (P. 150)形成了以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游牧经济文化与以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等为代

表的绿洲农耕经济文化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分属于阿勒泰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语言类型以及属于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的伊斯兰文化类型;属于汉族的道教文化类型;属于佛教文化类型的汉族、蒙古、锡伯、达斡尔和属于汉族、俄罗斯的基督教文化类型及锡伯、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文化类型。<sup>[3]</sup>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突厥文化、唐代汉文化、吐蕃文化、粟特文化不断幅射、渗透到新疆各民族文化之中。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各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不同的经济生产类型、艺术形式在这里展现出异彩纷呈的世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并存、多源发生的显著特征。

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多元宗教信仰并存是新疆宗教文化演变最基本的特点。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后逐渐发展成为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龟兹,因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自古以来就是联接东西文化的中枢地带,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公元1~3世纪初,佛教在龟兹得以广泛传播;3世纪中期,进入发展兴盛阶段;“伽蓝百余所,僧徒

收稿日期 2008-03-03

作者简介 陈旭(1969-),女,四川成都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多元民族文化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sup>[4](P.67)</sup>到了4世纪中后期,龟兹佛教出现重大变化,涌现出著名佛学家、翻译家鸠摩罗什和达摩笈多等多位得道高僧,鸠摩罗什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据传当时:“什道震西域,声被东国。”<sup>[5](P.532)</sup>至4世纪时,龟兹著名的苏巴什佛寺已经成为龟兹地区的佛教中心。高僧鸠摩罗什曾在此集聚当时的许多德高望重的名僧讲经说法。随着鸠摩罗什在龟兹对大乘佛教的译经弘法活动,大乘佛教在龟兹风靡一时,在鸠摩罗什的努力下,打破了小乘佛教在龟兹一统天下的情况,形成以小乘佛教为主,兼行大乘佛教的局面,直接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丰富发展。

#### 一、鸠摩罗什前期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当时西域各国王族的普遍崇信,迅速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为众多的信徒所追随,历经数百年而不衰。龟兹国以今新疆库车县为中心,包括拜城、新和、沙雅、温宿、乌什和巴楚、轮台县等部分地区,东西长千余公里,南北绵延600余公里,是丝绸之路之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龟兹石窟从公元3~12世纪,经历了近10个世纪的发展,集石窟建筑、雕塑和壁画为一体,是世界佛教石窟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史书记载当时龟兹境内寺院林立,石窟遍布,洞窟总数达600余个,在古龟兹全境均有遗迹可寻。龟兹地区现存的石窟就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7处。龟兹佛教石窟中大量反映了当时佛教兴盛的景象,其中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内部保存相对比较完整。壁画内容丰富、独具艺术特色、历史价值极高,是龟兹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石窟。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发展在4~5世纪,繁盛于6~7世纪,衰落于8~9世纪,是龟兹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在克孜尔石窟所发现的梵文残卷中多处提到王室成员对佛教的信仰,由此可见佛教在龟兹的兴盛程度。

龟兹地区的佛教信仰是从犍陀罗国传入的,而犍陀罗国是一个小乘的国家。受犍陀罗国的影响,当时龟兹主要盛行的也是小乘学。主要寺院都由小乘阿含学者佛图舌弥主持,舌弥是《阿含》学者,也是鸠摩罗什早期的老师,鸠摩罗什初次接触

到佛教经典是从小乘佛教典籍开始的。小乘有部主张一切法互为因果,法体恒有,崇信弥勒,视涅槃为胜果。龟兹石窟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筑、雕塑和壁画。在历史发展中,龟兹石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模式。龟兹石窟壁画是对佛教基本教义的浓缩。同时期的龟兹石窟的壁画大量反映的也是以释迦牟尼前世累世修行事迹的本生故事和本行等内容的小乘佛教思想。如“摩诃萨摩舍身饲虎”、“兔焚身施仙人”、“鹄焚身施迷路入”、“慈者脚踩母头受报”、“狮王舍身不失信”、“菩萨行慈不怖众生”、“须达庵太子”、“虔者尼婆梨王闻法身燃千灯”、“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猴王智斗水妖”等本生和因缘故事,画出佛为菩萨时的各种苦行形象,即前生作鹿、作熊、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此类等行菩萨道的各种故事形象的连环式佛传故事和说法图。克孜尔石窟壁画早期作品主要依据小乘佛教经典绘制,在高大宽敞的前殿正壁雕塑或彩绘佛陀生前在世时的故事,在石窟后室依后壁凿出安置“涅槃”塑像的长方形石床,围绕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及弥勒兜率天宫说法。整体反映出龟兹遵循的小乘佛教“惟礼释迦”、注重涅槃思想,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石窟艺术的一个主要标志。

#### 二、鸠摩罗什时期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术

鸠摩罗什,龟兹人,生活在公元344~413年,祖籍天竺,是中国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的佛学思想家和佛经翻译家,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南朝陈真谛、唐代玄奘、义净齐名的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的婆罗门种姓。父亲鸠摩罗炎抛弃相位出家,四处游历,向东越过葱岭来到龟兹。龟兹的白氏王室长期崇信佛教,从公元1~8世纪末,国内寺院林立,进入龟兹佛教鼎盛前期。鸠摩罗炎娶龟兹王的妹妹耆婆为妻,鸠摩罗什出生在龟兹。母亲耆婆十分笃信佛教,不顾家人的反对出家为尼,受母亲的影响,鸠摩罗什七岁时,便随母亲出家,当时,“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sup>[5](P.410)</sup>佛图舌弥是当时龟兹著名的小乘学者。鸠摩罗什师从佛图舌弥,每日诵读

大量小乘佛教经典。九岁后随母亲游历了克什米尔及葱岭东西诸国,拜瘡宾(今克什米尔)名僧盘头达多为师,学习小乘《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经典,据说能知阴阳、测星算,准确的预言祸福吉凶。在返回龟兹的归途中经月氏北山到达沙勒国时,十二岁的鸠摩罗什又师从疏勒僧人佛陀耶舍,后来继续向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求学问道,完成了由小乘改习大乘的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二十岁受戒,成为大乘信徒,开始了其弘扬大乘佛教的事业。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虽也有早期大乘、秘密部等流派传播,但主要是对小乘佛教的弘扬。《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记》记载:“外域诸国,或偏执小乘,最后涅槃槃,显明佛性,而犹执初教,可谓胶柱鼓瑟者也。……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惟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sup>[51]</sup>(P. 232)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同期的石窟艺术中。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小乘转变为大乘,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发展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鸠摩罗什天资过人,博学多才,对佛典理论的精髓见解,深受僧众敬仰,使大乘之学迅速推广,风靡一时。“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sup>[61]</sup>(P. 2309)在西域诸国掀起了一场弘扬大乘佛教的热潮连他的师父之一的盘头达多也对鸠摩罗什赞叹不已,赞誉他:“我是和尚小乘师,和尚是我大乘师。”<sup>[51]</sup>(P. 531)鸠摩罗什高深的文字功底,也将佛经翻译推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僧睿、道融、昙影、道标、僧肇、道生、僧略、道恒等得力弟子的协助和 500 至 800 弟子的参与下,鸠摩罗什用大约 11 年的时间译经 39 部 313 卷。其中,由他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成为佛教界最通用的大乘经典、律藏《十诵律》成为南朝佛教界通行的戒律、中观“三论”成为三论学派研究的重要典籍、《成实论》成为成实学派研究的主要经典,对于当时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鸠摩罗什声名远播西域,西域各国的国王,都很信服他渊博的学识,犀利的辩才,对他无比崇信,是大乘造詣与龟兹大乘势力都达到最高点的时期,龟兹成为大乘佛教的一个理论中心。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佛教教义的发展相辅相成,在克孜尔

第 189 窟中,绘于主室的托钵佛和千佛图壁画就是小乘中有大乘成分,托钵佛持着内为白色蛇形龙的钵居于画面正中位置。窟顶绘千佛呈辐射状环绕。这是大乘佛教在龟兹传播的直接影响,也是克孜尔开凿石窟最多的时期。

### 三、鸠摩罗什后期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术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苻坚时,坚遣其将吕光率众七万伐之,其王白纯距境不降,光进军讨平之。”<sup>[61]</sup>(P. 2543)吕光攻陷龟兹国后,鸠摩罗什被掳掠远走他乡,龟兹大乘派迅速衰落下来。开元十五年间,慧超从印度回国经过龟兹时见到:“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sup>[41]</sup>(P. 68)说明到了公元 8 世纪初,当地僧人的主要信仰依然是小乘佛教,而内地来的汉人、僧侣使得大乘之风再次在西渐,汉地佛教渐传入西域,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唐王朝 7 世纪中期以后,龟兹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西域重镇。据《新唐书·西域传·龟兹》记载,公元 692 年后,唐中央政府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派出 3 万重兵镇守此地,这时龟兹佛教仍然兴旺。大量的汉族军队屯戍戍边,带来的随军眷属、工匠及汉地僧人人数众多,为内地大乘佛教思想在龟兹地区的传播,奠定了条件。大量的汉使、汉兵、汉僧涌入龟兹后,纷纷建寺开窟,在龟兹建立了众多的汉僧寺院和石窟,同时将中原大乘佛教带回了龟兹,“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顶。王宫壮丽,焕若神居。”<sup>[61]</sup>(P. 2543)僧侣近万人。在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龟兹石窟壁画以敦煌汉风为主并融合当地壁画艺术,推动了龟兹地区汉传大乘佛教的发展。公元 7 世纪,在克孜尔石窟晚期作品出现了反映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思想内容的几个洞窟。小乘主张佛不并出,崇拜一佛一菩萨(弥勒),而大乘主张十方三世有无数佛。在公元 1 世纪后形成的大乘佛教,自称能承载世间的一切生灵,经过生死轮回,由此岸世界超越了欲、有、见、无明的苦海,到达永远消灭了肉体上生、老、病、死



的痛苦、消灭了贪、痴、愚、妄的烦恼,获得永远平安、寂静的彼岸世界。为了与其他教派区别,他们把初创时期的佛教和分裂成不同教派时期的部派佛教,都贬称为小乘,而自称为大。其中,菩萨在大乘佛教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大乘佛教认为菩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更有人情味,在信众中的影响也特别大。对菩萨的崇拜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特点。也是大乘佛教理论和实践的最主要化身。同期壁画中最多、最生动的是宣扬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日光、月光等大乘佛教菩萨行的菩萨形象。龟兹石窟绘满千佛的壁画,显然是受了中原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是中原大乘佛教思想在龟兹石窟中的表现。龟兹地区具有鲜明唐代汉风石窟的典型代表阿艾石窟也开凿在这一时期建造年代略晚于克孜尔石窟的库木吐喇石窟,无论是在人物造型、服饰构图、绘画手法、内容安排上,都显现出中原汉风的影响。千佛壁画也比其他石窟明显增多,除佛、菩萨等常见形象外,在题材内容上还出现了反映中原大乘佛教的“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等内容的经变画。许多窟在窟顶画出密密的千佛像。如右壁壁龛内一坐佛水波纹发髻,耳肥唇长,两侧的壁画是在腹部绘出一张凶相面孔的魔军,这种“脐中出眼”的画面依据大乘经典,明显地表现出向大乘佛教转变的痕迹。森木塞姆石窟壁画早期内容主要反映小乘佛教思想,公元 6~7 世纪后,反映大乘净土思想的内容汉风洞窟也开始大量出现。1999 年发现的阿艾石窟壁画题材刻画了汉地大乘佛教的西方净土阿弥陀信仰、东方净土药师佛信仰、卢舍那佛、文

殊菩萨、观音菩萨等信仰,大幅的经变体裁与尊像以及团花流云纹的运用,回鹘风和汉风洞窟的同时并存是此时期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文化的存在一直是新疆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多元文化的交融、相互渗透和共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新疆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佛教教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龟兹石窟是集石窟建筑、雕塑和壁画为一体的佛教艺术综合体,由于鸠摩罗什对大乘佛教的弘扬,极大的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形成以小乘佛教为主,兼行大乘佛教的局面,直接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季羨林. 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 红旗, 1986, (6).
- [2] 余太山. 西域文化史[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1995.
- [3] 贺萍. 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流变述略[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5, (1).
- [4] 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选注[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 [5]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 [6] 房玄龄等. 晋书(卷九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 [7] 李瑞哲. 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与小乘佛教[J]. 宗教学研究, 2006, (6).
- [8] 陈寒. 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J]. 西北大学学报, 2002, (2).

(责任编辑:李开荣)

## Kumārajīva and Diversity of Qiuci Buddhism Grotto Art

Chen Xu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of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At an early stage, Qiuci Grotto art mainly reflects the thoughts of Hīnayāna. Since the 4<sup>th</sup> century, the monk in Qiuci named Kumārajīva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Mahāyāna. Such practice made great difference to the diffusing of Mahāyāna in Qiuci, which greatly enriched Qiuci grotto art and promoted diversity of Buddhism Grotto art in Qiuci.

**Key words:** Kumārajīva; Qiuci; Buddhism; Grotto Art